

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编 万斌

# 永嘉四灵



徐 徐  
徐 照  
翁 玘  
赵 卷  
师 秀  
秀 传

吴晶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 永嘉四灵

徐 照

徐 夔

翁 卷

赵 师 秀

传

吴晶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嘉四灵:徐照、徐玘、翁卷、赵师秀传/吴晶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11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万斌主编)  
ISBN 978-7-213-03798-6

I. 永... II. 吴... III. ①徐照-传记 ②徐玘-传  
记 ③翁卷-传记 ④赵师秀-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3617 号

永嘉四灵——徐 照 徐 玘 翁 卷 赵师秀传  
吴 晶 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176516
- 责任编辑 陈巧丽
- 责任校对 朱晓阳 张谷年
- 封面设计 池长尧 殷 瞻
-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 字 数 25.2 万
-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213-03798-6
- 定 价 2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总 序

万 斌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

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顓、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

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 20 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 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 楔 子

“永嘉四灵”是南宋中期光宗绍熙年间至宁宗嘉定年间，即1190年至1224年的30多年间，主要生活、活动在两浙东路温州永嘉县的四位诗人的合称。他们是徐照(?—1211)，字道暉，又字灵暉，号山民；徐玑(1162—1214)，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翁卷(生于1159年至1168年间，卒于1228年后，一说卒于1243年后)，字续古，一字灵舒；赵师秀(1170—1219)，字紫芝，又字灵秀，号灵芝，又号天乐。

南宋温州下辖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四县，大致相当于现温州三区八县市范围，治所在永嘉县。当时的温州州城、永嘉县城中心部分就在温州古城墙内，东到华盖山，北临瓯江，西南以松台山、会昌湖为界。这从西晋郭璞定温州古城位置以来到20世纪初基本没变，今温州市中心即鹿城区中心区域也还在此。当时温州(永嘉县)郊区部分还包括今瓯海区、龙湾区、永嘉县的部分区域。以往大都认为“四灵”只有翁卷是邻县乐清县人，其他三人都是永嘉县人。其实只有徐玑可确定是永嘉县人，家住松台山下，赵师秀作为南迁温州的宗室子弟很可能住在州(县)城里，但无确切记载，徐照老家塔山是在城外山村。徐照、翁卷后来先后迁居州(县)城，四人齐聚城中，因人生志趣、诗歌审美取向相投，来往唱和日密。原本四人中只有翁卷字“灵舒”，后其他



三人也以“灵”为字号，这就是“四灵”名号之始。因他们当时都在永嘉县城，又因温州在东晋初建郡治时称永嘉郡，文人多好古、喜用古地名，四人都可称“永嘉”人氏，于是有“永嘉四灵”之称。因本书中考证徐照故里可能在今永嘉县，以往一些研究者对“永嘉四灵”的“永嘉”这一地名概念又常有不分古今的解析，为将此“永嘉”与今永嘉县加以明晰区分，避免引起混淆、以讹传讹，本书中除特别注明为今永嘉县外，其他“永嘉”均指南宋时的永嘉县。因文学史中没有别一“四灵”，不至于引起误解，本书中也简称“永嘉四灵”为“四灵”。

绍熙元年(1190)，赵师秀中进士，徐玠承父致仕荫入仕，此时四人都已开始写诗，且与温州前辈诗人多酬唱，并都薄有诗名。到嘉定十二年(1219)赵师秀去世，“四灵”只余翁卷。“四灵”诗友、温州诗人薛师石在绍定元年(1228)去世，他晚年时翁卷还在世。一说翁卷在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还在世，但不能确定。由此，本书将“四灵”兴起和影响诗坛的时间定为绍熙元年至嘉定十七年间(1190—1224)。以往一说“四灵”崛起于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似嫌稍早，此时他们年纪尚轻，还未形成个人诗歌特色，更主要的是，虽然徐照、翁卷早年在故乡山中就已交往唱和，翁卷、赵师秀也在温州西郊太平山中寺院里一起读书、联吟，但四人还未齐聚。绍熙元年前后，徐照、翁卷先后都迁居徐玠家附近的松台山边、会昌湖畔，此时温州前辈诗人潘耒也回乡定居华盖山边，与他们多唱和，对他们的诗歌影响不小。到庆元四年(1198)，徐玠、赵师秀先后为官期满或罢官回乡，赵师秀后寓居会昌湖的南湖(南塘)，此年叶适也因党争罢官回乡，定居会昌湖上水心村，此时湖上湖边还多被贬或隐居的温州士人。“四灵”聚首州(县)城西南，在游赏山水、来往唱和中成为知交。他们都是失意科举或仕途的寒士文人，在当时宋金对

峙、天下貌似太平却令人窒息的大时代背景中和“庆元党禁”之风正烈的严酷政治低气压下，难有现实作为，心怀幽思，只能以诗寄托。四人以家乡山水、隐居生活为诗歌内容，承温州本土由南朝时宦游者谢灵运开创的清圆空灵山水诗风，并深化潘耒等人传入温州的对中晚唐诗的学习，又有叶适、潘耒等前辈指点；一时佳作甚多、诗名大振，并将清瘦野逸诗意发扬到极致，“四灵”组合崭露头角。到嘉泰二年（1202）前后叶适等温州士夫被朝廷起用复出，徐玑、赵师秀重入仕途，翁卷、徐照也重履江湖，这四五年在乡蛰居的日子正是“四灵”诗风兴起、发展及出现首次高潮之际。此后，“二徐”的永州之行，赵师秀的到江西为官，翁卷的入越帅幕府，都是他们个人成长、诗风成熟的重要契机。到开禧二年（1206）“开禧北伐”中叶适在江淮力挽战事狂澜，翁卷入其幕协助抗金，也成为日后翁卷诗风较阔大放达、在“四灵”中自成一家的重要原因。这些仕宦、入幕生涯的历练都为“四灵”诗增添了隐逸生活、山水田园风光外的人生与社会现实内涵。以往也有人认为“四灵”出现在嘉定年间（1208—1224），又似嫌太迟，此时已是他们创作的第二个也是最后的高潮时期了。叶适在嘉定元年（1208）再次罢官回乡，居水心不复出，潜心学术、诗歌，对“四灵”多指点揄扬。“四灵”此时也多隐居家乡，与住会昌湖西“瓜庐”的薛师石等温州诗坛后起之秀唱和，这些年轻诗人多向“四灵”问诗，松台山边、会昌湖上仍诗会不断，“四灵”诗风进入了成熟和转型期。到嘉定四年（1211）“四灵之首”、“四灵”中首倡唐诗的徐照去世，嘉定七年（1214）“四灵”组合主要组织者、他们的诗论家徐玑去世，标志着“四灵”组合黄金时代的终结。嘉定五年（1212）赵师秀去了京城临安（今杭州），此后翁卷也多在外地漂泊谋生。到嘉定十二年（1219）赵师秀去世，嘉定十六年（1223）叶适逝世，嘉定之后的诗坛已是“江湖诗人”

的天下。早先赵师秀在温州尤其京城时已多与“江湖诗人”交往，身为“四灵之秀”，他的诗成为“江湖诗人”们学习的典范。翁卷也多与“江湖诗人”来往，晚年他生涯漂泊，诗风更渐多“江湖”味。“四灵”组合后期，赵、翁两人已渐入“江湖诗派”，成为其间独特而重要的一分子。

“永嘉四灵”其人其诗，历来评价分歧颇大。有奉其诗为主臬的，也有贬其为野狐禅的。历来都有人以为“四灵”诗内容平淡无奇、感情不热烈充沛、格局境界不宏大、意象意境单调多重复，总体成就就不大，能在文学史上留名已是侥幸，多半是托当时“中兴四大诗人”多老迈退隐及诗坛寂寥、诗人寥落所赐。至于“四灵”其人，历来也有不少人认为他们一生或隐居或为门客、小官，无甚大作为，今天也有人对他们入选“文化名人”表示惊奇。“四灵”确是幸运的，作为一群才情不富、专心写山水诗、醉心诗歌艺术的诗人，又生在南宋衰世，身处温州这一东南一隅的山海之乡，本已注定默默无闻的命运。但他们终于“灵风”乍现，且在南宋半壁江山中、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赢得比他们实际诗歌成就还要高的“生前身后名”，这无疑和他们出现的时间、地域关系匪浅。南宋温州因宋室南渡由相对僻远之地成为身近皇都的大邑，而东晋尤其晚唐五代以来本土文化的发展也使温州人才、诗风渐盛。徐照、翁卷是五代福建移民后代，徐玠是南宋福建移民，赵师秀是南渡南迁北方士族子弟，还有叶适、徐照、翁卷等人由瑞安、乐清县城及温州、各县城郊等地向温州州城（永嘉县城）的聚集。天时地利际会凑泊，“四灵”才得成为组合，正如徐照在《病起呈灵舒、紫芝，寄文渊》中不无庆幸说的“唐世吟诗侣，一时生在今”。不过，“四灵”得以扬名天下也并非完全依靠机缘巧合，他们也曾作出主动选择和不懈努力。作为温州人士，他们骨子里都有“与天争”的精神，又自小受“永嘉学派”学说濡染，信奉

事功哲学,不甘平庸际遇。因仕途未达,他们便全力写诗,以诗为人生、生命。他们受同乡前辈诗人潘耒、许及之等学唐人诗风的熏陶,也受“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开启的温州诗歌传统影响,选择了写山水诗、雕琢精微的创作手法。他们还以“永嘉学派”学说灵活求变精神,顺应时代诗风之变,承当时杨万里等诗人所倡的向中晚唐诗风复归的趋势,又进一步选择了其中与自己个性诗风相近的贾岛、姚合等人的清瘦平淡诗风,加之此时温州文坛宗主叶适的引导,终使他们最初有意无意的选择变成刻意的追求。“四灵”还受叶适影响,执著于诗歌托物言志传统、自然平淡诗风的典范,反对当时理学家贬抑诗文之美的见解,对当时一统天下的“江西诗风”末流生硬、夸张、粗糙习气带来的艺术缺陷、非杜甫不学、取径太高而画虎不成的偏激诗论表示了异议,力主扭转其用典过多、晦涩拗峭的不足。借助对当时已成强弩之末、引起时人审美疲劳的“江西诗风”脱离现实生活弊端准确而有力的反击,还有“四人一体”的力量,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声名。

“四灵”诗当年的成名绝技和今天尚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主张诗歌回归真实自然的山水和日常生活、个人情感,即“捐(放弃)书以为诗”<sup>①</sup>,并以白描手法、苦吟手段,创造一种由生新中见平淡圆熟、由雕琢里得生动自然的诗风,在平凡人生、生活中求诗意、禅意的灵光。“四灵”之“灵”来自温州奇秀山水和灵异地域文化,还源于历史上两次人才和文化南迁时来游温州的南朝谢灵运、孙绰、丘迟和中晚唐孟浩然、张子容、罗隐、崔道融、陈陶等诗人开创发展的山水诗风。戴复古的《哭赵紫芝》诗说赵师秀是“东晋时人物,晚唐家数诗”,只有认识到“四灵”对任情放达

<sup>①</sup> (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韩隐君诗序》。

的六朝人物风度、尖新流美的晚唐诗歌情韵的追慕，认识到他们是把写诗作为一种寻求诗意、艺术化人生的手段，才能真正理解和正确评价“四灵”。南宋推崇“晋宋（六朝）人物”，“四灵”恰都有着梅花般清癯的容貌气质，珠玉一样清圆的文字，行药、斋居等清逸习性，一言以蔽之即“灵”气十足，正满足了偏安时代人们对名士形象的期待。南宋是个才子学者太多、诗人太少的时代，“四灵”寄情山水的清空诗风、磨砺莹润的艺术追求显得格外可贵，尤其人如其诗的清瘦野逸风采，使他们成了南宋中期一代诗人偶像。

不过，也许以往人们过于强调了“四灵”诗学唐人的一面，他们的诗在宋诗里别是一家，但仍具有宋诗化俗为雅的特征。“四灵”诗最出名的一首《约客》（赵师秀所作）中“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一联体现的闲适情调，就是在南宋时成熟的宋型文化即由世俗人生、寻常生活中追求士夫雅文化之趣的典型象征。“四灵”诗并非对中晚唐诗的一味模拟，也并非宋初崇尚晚唐诗的“九僧”、林逋等人诗的简单复归。正如他们虽学六朝人物，却因生活在理学盛行的时代，决定了他们必然少了狂放任性，多了执著理智。

“四灵”组合存在期间，形成了“四灵体”诗，还影响了一批年轻的温州本土诗人，并和前辈诗人一起组成“四灵诗派”，形成真正成熟的“永嘉诗风”。“四灵”还影响了“江湖诗人”群，更以刘克庄《题蔡炷主簿诗卷》说的“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的影响力，成为南宋中后期最不可忽视的诗坛力量。但“四灵”也是寂寞的，他们取得的名声与地位在身后不久就落入低谷，因为他们与“永嘉学派”的密切关系，还有学晚唐诗、反对“江西诗风”的立场。“四灵”反“江西诗风”，与“永嘉学派”和理学正宗的分歧很相似，“永嘉学派”只是宋代理学派别内部的异端，正

如“四灵”诗只是宋诗的别调。但由于后来自命为承理学道统者与“江西诗派”传人的森严门户之见和狭小气量,排斥贬低“永嘉学派”和“四灵”,使他们被放逐到文化史的边缘。正如温州在南宋之后随着都城北迁重为南蛮之地,“永嘉诗风”也渐渐湮没入市井,在元明清三代只偶然闪露异彩。在所有反对“四灵”的声音中,宋末自命为“江西诗派”嫡传的诗人方回、只喜欢盛唐诗风的诗评家严羽对“四灵”声誉变化影响最大。他们的见解,如“四灵”诗格局狭小、格调卑下、“人声闻、辟支之果”(见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即将“四灵”诗比作只求自度的小乘佛教教义等,后来成为诗史上的主流观点甚至常识。更有甚者,当时一些对“四灵”的评价超越了诗歌和文化的范畴,正如“永嘉学派”在宋末成为理学家道德攻击的对象,“四灵”所学的晚唐诗向来被视为亡国之音,一些南宋诗人如陆游虽爱晚唐风韵却从不敢明言,宋亡后,“四灵”和“江湖诗派”的诗更被指责为宋气脉已尽的讖语甚至原因,背负了“莫须有”的恶名。此后一直到近现代,“四灵”声望一直不高,道德上的无端指责虽不见了,但很多学者仍承方回之说。如缪钺先生就曾在《宋诗鉴赏辞典》的序言《论宋诗》里说“永嘉四灵”如“爝火微光,无足轻重”,影响更大的如钱钟书《宋诗选注》里将“四灵”其人其诗比作杜甫《白小》诗中的小鱼“白小”,以为他们四人一起才略有可观。如果不是暗含贬义,这个比喻还是很巧妙形象的。温州话里也有“白小”一词,指温州水域里常见的一种长不大的鱼,非常灵活、有生命力。也许从这个角度将“四灵”比作“白小”更有意义,南宋中后期的“江湖”生态环境里不可能滋生杜甫笔下的碧海巨鲸、庄子笔下的神奇巨鲲,只有这些小鱼般的诗人聚生其间、相濡以沫。“四灵”不遇、穷寒的身世在当时和后世都很容易引起中下层文人的共鸣,他们所学的中晚唐苦吟诗风也很合大多数才力不大诗人的口味,后世

受他们诗风影响的诗人很多,如明清的竟陵派、浙派等,他们的徒子徒孙如“白小”般满布天下江湖。如果有耐心细致地通读“四灵”诗篇(他们的诗集到今日已非原貌,流失了许多精妙篇章字句,很可惜),虽然的确清瘦单薄了些,但仍给人瓯山越水般山不高而挺峻、水貌似清浅而颇深的印象,当可改变很多人的偏见。还有一个关于“四灵”最常见的成见也当出于误解,他们常被诟病为眼睛只在贾岛、姚合身上打转,趣味太狭窄。其实不然,如赵师秀不但选过《二妙集》即姚贾两人的诗,还选有《众妙集》,选了从初唐开始的唐诗人76家,虽未取杜甫,但选取了不少大历、贞元、元和年间诗人篇章,眼界并不算太狭。叶适还曾解释说“四灵”并非不喜杜甫,只是为纠“江西诗派”只学杜甫之弊才矫枉过正,而且他们学中晚唐诗有取径元和年间以前诗以接近杜甫的企图,“四灵”诗虽因人寿苦短没达到这一理想,但努力是不可抹杀的。还有常被提及的“四灵”不关心时世说,也不无偏颇。“四灵”在深切关注个人内心悲欢之外也不乏感时忧世的一面,如赵师秀登镇江多景楼望长江以北沦陷地的《多景楼晚望》,就和当时许多诗人的同题材诗作一样饱含“新亭之悲”;徐照的《促促词》、翁卷的《东阳路傍蚕妇》等诗,也道尽人世间民生多艰及诗人的悲悯。历来被视为对现实生活较冷漠隔膜的“四灵”诗里,其实时时闪耀感慨现实世界、个人命运缺憾的理想主义色彩,只是表达较为隐晦含蓄。

由于上述成见影响颇深远,很多人只对“四灵”诗作过浮泛一瞥,就武断地加以低看,或者干脆人云亦云。当然,这也和对“四灵”其人其诗研究不深入、不全面有很大关系。由于“四灵”诗在后世长期遭忽视、误解,“四灵”也成了文学史上“熟悉的陌生人”。以往说起“永嘉四灵”,给人的印象就是“四人一体”、“四人一面”,其实四人的经历、性情都很不相同,正如他们的诗在相

似中各具特色。徐照终生为布衣，翁卷曾中乡试，两人都曾隐居，还曾为门客或游幕。徐玘承父荫入仕，做过几任八品、九品小官。四人中只有赵师秀中了进士，但他也只是由选人改官为京官，官位止于八品。四人多隐居家乡山林，或漂泊羁旅外乡，生平史料很少，并缺乏整理，时有矛盾谬误，未入仕的徐、翁两人资料尤少，如徐照生年故里、翁卷生卒年等都没有确定说法，更难以借已知资料形成确切详细的年谱。而且四人现存诗集都只有一二百首诗，许多诗无法明确系年。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他们诗歌内容的理解，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他们诗的总体评价。也正因此，以往的“四灵”研究文章多只能着眼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歌特色等方面，很少论及他们的生平交往。所以，写一本以“四灵”生平研究为主的书似乎并非多余，权当抛砖引玉，希望能对急需推进的“四灵”生平研究有所助益。本书引用了一些“四灵”研究者们近年的研究新成果，也由温州地方文献、“四灵”诗、同时人尤其同时温州诗人、“四灵”诗友诗中得到的新发现，对过去的一些说法进行了纠偏补漏，还有对“四灵”诗和人生的潜心解读。书中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见解，由于见识鄙陋、资料匮乏，肯定会有许多不足和错漏，敬请各位贤者指正。

因需要搜集大量资料，本书前后写了三年，数易其稿，写得也如“四灵”写诗一般辛苦（翁卷有《次徐灵渊韵赠赵灵秀》诗说“诗囊茶器每随身”，写了“四灵”像李贺一样带“诗囊”出门寻诗、归来苦吟的情景），但也很有乐趣。写这本传记前，我虽为“四灵”同乡，也读过不少他们的诗，但对其人其事知之不详，写完此书后才了解他们多一些，对他们的诗多了一些领悟。我对这四位和我来自同一小城不同时空的清瘦穷愁却灵思四溢的诗人、狂热真诚的文学青年，有了莫名的好感，恰如“四灵”当年对晋



人、唐诗的微妙认同感。他们的奇高气、卑薄命运，他们的刻苦努力，尤其是对诗的执著，带着书生气、理想主义色彩，都特别容易让人感动。他们也许眼界不广、才情不富，但和以歌诗为余事的诗歌大家不同的是，诗就是他们的生命，苦吟甚至缩短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命。

比“四灵”稍早的温州诗人郑伯英有《放龟》诗说“城中有四灵，麟凤神龙龟”。徐照四人被称为“四灵”，和他们身后这座处于山海之间、充满灵异气息的城市温州大有关系，“四灵”正象征了他们栖身市井与山林间、亦奇亦俗的身世和名声。“四灵”的城中寓所，他们诗中的许多地名，是如此亲切。他们诗中的“西湖”，有些是杭州西湖，大多却都是温州会昌湖的西湖，离我少年时在水心的家很近。还有翁、赵笔下的南塘，我幼时住过的祖宅就在古城南的大南门，不远处是温州古“九山”之一的巽山，山上有雁塔，再向南便是南塘河和南塘街，20世纪70年代，那里还是一片水乡景色，和“四灵”游时应变化不大。想象着“四灵”在南宋温州城里或城郊城外的会昌湖水心村、南塘、雁池、松台山宿觉庵、华盖山谢池与容成洞、太平山太平寺、郭公山富览亭、江心寺、雁荡山等地聚会吟咏，我常在下笔时会心而笑。还有他们诗中写到的温州多雨的天气、多水的地貌，也都是我所熟悉的。最令人向往的是，南宋文华最盛时是在13世纪前期，即宁宗庆元到嘉定年间（1195—1224），恰与“四灵”盛衰始末大致重叠。此时理学上朱熹、陆九渊、叶适三家鼎立，词方面有辛弃疾、姜夔双峰对峙，诗上则是“四灵”、“江湖诗派”和“江西诗派”由对立走向融通。这期间，江南之地龙虎际会，温州一隅也是钟灵毓秀，孕育出六朝、中晚唐后的又一次文化与诗的高潮。徐玑《中秋集鲍楼作》有“明朝此集喧城市，应说风流似永和”之句，说“四灵”等人在会昌湖畔的一次唱和的文采风流可比东晋兰亭雅集。再